第一章

* 1961年8月12日，一位享年87七的伟人在北京辞世了。中国政府特授予国葬仪式。前往吊唁者多为身份显赫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包括朱德、周恩来、陈毅、陈伯达、廖承志、董必武等。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及其他人士献上花圈并向其家属慰唁。灵枢由专列运出北京，八月二十日抵集美，安葬鳌园。这一座壮丽的墓地，是他亲自设计的，园址也是他早已检定的，吊唁者云集在集美通向鳌园的通蘅小道上。追悼会在包括北京、福州、厦门、广州在内二十三个中国城镇举行，追悼活动一时也蔓延至海外华侨聚集的各大都市如香港、九龙、新加坡、仰光、耶加达、三宝珑、万隆、泗水、巨港、坤甸、横滨、加尔各答、巴黎、利普芝（东德）等处。
*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在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自1890年至1950年，他一住星洲50余年。
* 他生活在中国历史剧变和东南亚社会与政治急变的年代，他见证了满清王朝的衰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兴衰及共产党领导下新政府的成立。他也目睹了，不断茁壮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下，东南亚，尤其是新马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日渐式微的情景。
* 在陈嘉庚诞生前二三十年间，清军在鸦片战争中（1839至1842及1856至1860）一败涂地，紧跟着是不绝如缕的农民起义，其中较著名者为太平军、捻军及回军之事。中国老百姓损失奇重——四千万人丧亡，五口通商，农村经济凋敝，一八六零年鸦片被规定为合法售卖使白银大量流出中国，国库顿呈虚空。
* 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军事化过程，导致地方割据局面及现代军阀主义的兴起。
* 华南一带掀起的出洋热，给海外带来了大量的寻金客、寄身客
* 十岁时，中法战争爆发，福州船厂被炮毁，中国南洋舰队被击溃，1894至1895年中日在朝鲜开战，中国北洋舰队魂葬黄海，马关条约使台湾强让于日本，也赔了二亿两银子，1949年，陈嘉庚将此事件之影响亲口陈述，他指出，当时台湾，福建对外物物交换贸易受日本人一手垄断后，福建商人受到巨大打击，人民自由往来受阻，闽南一带手工纺织业陷入全面停顿。他指出自己早已意识到日本的侵略本性及满清的无能保持领土完整，此次战争的痕印及屈辱条约催生了日后为民族自强运动的爱国主义者。
* 中日战争后，列强步步进逼，夺占租地及广大各自的势力地盘，中国受瓜分之势已迫于眉睫，在列强争遂分肥的扰攘声中，中国北部爆发了义和团的起义（一九零零至一）。西方列强与东洋日本携手共进北京，中国的京城但见熊熊火光，起义被碾平，清廷俯首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予参战诸强，相当于清廷岁入的十倍。日俄在中国领土上大动干戈，清廷虽不曾介入，却蒙受池鱼之殃。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爆发之势日渐明朗后，西方列强无心恋战，助长了日本吞华野心，他们公然的及肆无忌惮的压迫也出现了。一九一五年，他们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如果袁世凯接受各条款，中国将沦为日本之保护国，凡尔赛协议也给中国增添屈辱，因为贵为第一次大战战胜国，却要将德国人在山东之利益拱手让予日本。这一个耻辱事件引发了“五四运动”，历史学者迄今仍继续评估此次运动的影响。凡尔赛协议播下中日再次冲突的种子，一九二八年五月蒋介石北伐军在山东济南与日军的冲突既是。此次冲突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也为中日第二次战争（一九三七至四五）埋下伏线。在此场漫长战争中，蒋介石军队还撤退至西南方四川省之重庆市，让日军控制了中原美好山河。中国与列强间所签署的一切条约，导致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以为外货流入大开方便之门，也使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似此扰乱局面，任何冀图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努力皆化为泡影，与之相反，它却使千百万头脑清醒之士，内心感到压抑，悲愤，爱国主义精神遂化为各种各样的思想方式在海内外呈现出来：自由主义、民主思想、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个深以文化为荣者怎能目睹“神州沦陷”而袖手旁观呢？
* 看起来仿佛外患频繁仍不足以挫伤中国人之心灵，辛亥革命虽推翻满清统治，接踵而至的却是一片政治对立、军阀混乱局面，为中国现代史谱写了最丑恶的一页。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军阀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拉夫为辅，又陷人间于水火，大地上弥漫着一片灾难、不幸与失望。一九二七年始，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清党行动，极力镇压与屠杀异己，实行恐怖与军事统治。老百姓欲安身立命，又苦于找不到一个能为他们带来和平稳定效能卓著的政府。政治对抗与武力镇压导致国家危机，出现了国共间的最大战役，第一次内战时期（一九二四至七），中共党人被捕监禁及枪决者，难以数计，许多被迫潜入地下。第二次内战时期（一九二八至三五），国民党军队对共军华中据地进行了五次大围攻，引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红军历经万苦千辛，跨越十二省份，最终抵达延安。最后一次内战（一九四六至九）的高潮是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共军在东北、华北及华中发动了大反攻，蒋介石军队逐离中原，最后偏安台湾。内战绵绵，外债重重，其间中国广大人民生命与财物损失之巨，只有十九世纪中叶之农民起义足堪比拟。而中国广大人民内心痛苦与烦恼之深，却非笔墨所能形容。
* 除属于人祸之内忧外患外，中国也发生了现代史上规模浩大的数次天灾，苦旱、水患、瘟疫、饥荒，不绝如缕，而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又使灾情无从减缓，更置灾民于水火中备受煎熬。一八九零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所发生的自然灾害，激起了身居海外的富侨们的同情，4他们挺身而出展开一系列赈济工作，各式各样的筹募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于是，在海外华人中之政治觉醒与追求中国富强维新的意愿之外，也衍生了一种道义激情与动力，此乃海外中国民族主义中一种比较温和的内蕴。
* 这一些漫长与剧化的中国民族危机，终于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皆殚思竭虑，尝试借助西方经验以结合中国实际来拯救国家于水火。这些领袖皆立足于政治前线，被誉称为“先知先觉者”，他们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陈嘉庚却不曾置身于这些政治风暴的中心，然而，举凡中国的一切社会、政治与权利的变动，始终不曾逸离他的注意力，也一再染化着他的政治意识，激励着他的政治行为。像其同时代无数的华族移民，当祖国当政者显得颟顸无能时，他即陷入失望中；当国家濒临内战边缘时，他即陷入彷徨中；当国是乖离正道时，他即感到义愤填膺。作为一位关心国事，深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教诲者，他绝不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因此，虽有千里河山之阻隔、英国殖民统治之束缚，陈嘉庚皆借助各种时机在国内外进行一些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努力。
* 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现代中国的政治命运一再熏染他的政治信仰，并指引他的政治行动，英殖民主义在新加坡的统治却一再限囿着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而当转口贸易、自由企业所带来的经济与兴旺一再塑造他的温和改良主义思想时，新加坡华人社会与社区结构却不曾为他的社会政治领导角色与志向设置任何难以逾越的障碍。
* 海峡殖民地政府在开始时是向伦敦的宗主国负责的。迄一八六七年，它接受英国殖民部管辖，于是，在总督之下，遂有了一个立法议会与一个行政议会的产生。立法议会中有官委与非官委议员之分，非官委议员乃受当局委任者，在议会中居少数。行政议会人数不多，且全为英殖民政府官员。二十年代开始才有数名亚洲籍人士被挑选而进入行政议会，参与本殖民地一些决策工作。立法议会的职能是辩论，反映民意及立法，行政议会则专责贯彻所颁布之法令及有关殖民地的其他行政职务。凡有关海峡殖民地中华社的问题，则由华民卫护司署向总督提供咨询，最后由总督定夺，华民卫护司署成立于一八七七年，后改为华民政务司署。一八八九年，华民卫护司署成立华人参事局，委员多来自华社中之各个帮派，以聆取彼等之意见。5殖民政府借助它来调谐或缓冲彼等与华社之歧见或紧张关系。
* 英殖民当局比较偏爱侨生华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们绝大部分为英文教育者，又多为律师、医生、工程师、绘测师与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他们在培育下充当华社利益之发言人，使华社中之移民华人即嫉且恨。尽管如此，由于一九四五年以前，公民权与议会民主仍未见存于新加坡，这些英皇子民在政治动力上作为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移民华人继续仰赖中国方面之指示与声援，这种态度造成殖民统治下华社欠缺真正动力的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这一种现象，加上英殖民地主义者对华人社会文化与语言的漠视，致使一些优秀的侨生专业人士及学者如辜鸿铭（一八五六至一九二七），伍连德及林文庆（一八六九至一九五七）等先后返国服务。6
* 英国人与东南亚所有西方殖民主义者无异，他们素来即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在星马的政治权益，并且抗拒在思想上、政治上真正的或想象的“颠覆分子”。他们颁行社团注册法令以驭控社区行动。他们视为“颠覆”及危害法制者如华人私会党、国民党分部及后来之马共及其细胞组织等，一概被封禁。同样的，那些触及“刑事”或“政治”罪行者，如参与“非法”团体，一律被捕入狱或押解出境。英国人利用这种严峻政治手段，如培植一群更令人“接受”的社区政治领袖，即一种思想上温和、行动上属改良性的政治领袖。此外，英国人对华社中领导人物的合作者与守法规者也比较宽容，让他们从事亲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并对他们的行动“合法化”。陈嘉庚之被视为此类“合法化”领袖，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熟识转寰之术，也随时准备在不逾越殖民地法律框框的情况下从事社会与政治工作。
* 殖民主义者另一种比较委婉的统治手法，是对思想意识的操纵。这一种方式是通过报章、邮件检查及教育监督等途径积极进行的。邮件检查旨在遏阻“颠覆性”思想的传播，所谓“颠覆性”思想即指反西方、反英民族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等。一九二零年颁行的学校注册法令，旨在加强对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华文学府的控制。法令授权个别教育部门可以政治或思想信仰为依凭来对待学校之申请或教育职员之取舍。同样的，在一般情形下，只有“颠覆”思想之华族人士，亦不能接受为认可的社区或政治领袖。在新马社会，一种急近昂奋、多姿多彩的政治领导方式，即在英国当局的这种种思想限制下，受到进一步的阻碍了。在战前马来亚，陈嘉庚之社会、政治思想之所以能大部分地为英国人接受，基本原因乃在于，它是导向于反对日本侵略华的。尽管如此，由于英国人在中日战争中始终保持一种“中立”态度，他们之间的关系亦一度呈现紧张。战后时期由于英国人始终与蒋介石政权保持友好关系，乃与不断抨击蒋介石的陈嘉庚出现了类似的紧张局面。
* 与政治上及思想上的严峻控制相比，英国人在经济政策上却显得开明多了，他们极力鼓吹自由竞争与发展个人企业。这种开放的经济政策激发一些勤奋华侨努力积累资本，并投资于星马各个经济领域中。英国人自一八七四年始即介入烽火处处的马来联邦，平息战火并恢复治安，为新马资本之涌入马来半岛铺平道路。中国与印度劳工的大量涌入加上中国人投资于海峡殖民地中风险巨大的一些项目，也促成了二十世纪时马来联邦商业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两项工业活动也促进新加坡之转口贸易，为它日后崛起为东南亚各国之贸易总汇、金融中心，扎下牢固的基础，华人在私会党保护下通过廉价劳工在采锡业中赚取巨额利润，复将此笔巨资投向银行、保险、制造及船务业上，并在本世纪初与欧资企业在出入口贸易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 陈嘉庚有幸置身于这种有利的经济环境中，立足于新加坡这么一个允许勤力、精明、目光远大、坚韧不拔的人获取财富、名望乃至社会地位的地方。他攫住机会使自己于一九一一年成为百万富翁，旋于欧战结束时成为超百万富翁，有了大量财富，他才能够，也愿意为叻闽二地做出了社会与教育方面的巨大贡献。他在自传《南侨回忆录》中坦言，若非获致足够资财，自己一生的社会政治事业乃无基石。7
* 一八一九年后之新加坡社会虽已为多元民族所共处，惟其自由港地位及英人之开放政策，却引来了中国沿海一带的大量移民，使马来人口在比例上急剧下降。自一八六零年开始，新加坡华族人口已凌居上风。一九二一年，在三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名全部华族人口中，移民占七十五巴仙。十年后，全岛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名华族人口中，移民比率降至六十四巴仙，至一九四七年，移民压倒侨生华人的形势才扭转过来。按该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全部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三名华族人口中，侨生者占据了六十巴仙。即使是在这个比较晚近时期出生的华人，大多数仍然是接受华文教育、口操华语者，他们在文化上、在思维方式上一般还是倾向华侨社会的。
* 不过，总体上说，与华侨社群相比，侨生华人的思想与生活方式都是比较西化的，他们在更大的华人社群中，也是比较现代化的一群。侨生华人社群一路来亦能培养一批批能力卓著，德高望重的领袖，为殖民当局所认可。由于口操英语，大多数乃被聘为公务人员、当行政长官、书记或其他职位。他们也在私人机构，尤其是在银行、保险公司、船务公司及洋行中任职。众所周知，侨生华人之最大的愿望乃充当买办，即成为欧资银行、洋行与公众之中介人。在商场上，他们一样长袖善舞，二十世纪数闻人如林文庆、李俊源（一八六八至一九二四）、林义顺（一八七九至一九三六）及其他几位，乃当地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及企业的创办者。或者是为着吸取一些华侨资本以支持自己的新投资吧，他们与华侨社会首领与资本家频频合作，共同推动与华侨社会利益相关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活动。侨生华人社群也组织了不少社交团体如俱乐部、体育会等，其中最为人知的乃是海峡华人公会（SCBA),它创办于一九零零年，是侨生华人争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压力团体。
* 必须承认的是，陈嘉庚时代的华人社会是四分五裂的，主要是语言、教育背景、地域观念、职业类别及政治观点等差异，加上帮派间的对抗、帮派间领袖之私怨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实质上看，新加坡华人社会可轻易地就方言类型归纳为七个大小不同的帮派，即闽帮，以福建漳、泉二大州移民为主。此外尚有潮帮、广帮、琼帮、客帮及侨生帮。侨生帮代表一批受英文教育、口操英语者。最后是三江帮，此帮代表闽、广二省北部少数移民等。
* 无论在传统上或人口数量上说，闽帮在新加坡历史上始终是一个主要的单一的帮群。一八八一年，他们在新加坡华族人口比例上占二十八巴仙，至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一年及一九四七年，一直保持在四十三巴仙之水平。福建人乃十九世纪商业泰斗，迄二十世纪，在这一些更为新兴的经济领域里，如银行业、保险业、金融业、船务业、树胶加工与制造业及出入口贸易中，更是独占鳌头。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福建帮享有的人口优势与雄厚财力，使他们不论在竞争素质及同心协力上皆较他帮稍胜一筹
* 潮帮与广帮在规模上可说是旗鼓相当，二帮在一九零一年总华族人口比例上占三十五巴仙，一九四七年为四十三巴仙。潮州人士于十九世纪时在商场上表现不俗，控制了胡椒、甘蜜种植与买卖生意。他们中多数曾在柔佛一带置业，然而经济管理与营业扩充上表现的过于拘谨，他们不能及时抓住树胶业的好势头。广东人士则曾以手工艺之精湛著称于十九世纪，惟大部分却于二十世纪时转入零售行业。琼州人多操户内工作，或为船货供应商及开咖啡餐室等。客家人士在十九世纪时，多在新加坡务农，迄二十世纪则散见于各行各业中。三江人士南来较晚，惟至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时期已逐渐汇集力量，尽管如此，他们在今日仍属小社群。
* 华侨社会不但生机旺盛，而且还是力图上进的，尤其是在社会与教育领域的表现。华社常在创办学校、慈善团体、同乡会、社交俱乐部、宗亲团体及庙宇等方面，出钱出力，不遗余力。英官方自一八九零年始即逐渐封闭与取缔华人私会党，使其影响逐渐式微。一九零六年创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二十世纪华社的最高组织。它是一个帮际团体，董事会是由各帮推举代表组成的。福建帮因人口优势而获得更多董事职位之分配。至于会员，乃由各帮自行征召，故推选董事也沿此方式，所以说，新加坡的华侨社会基本上乃是一个以帮为本位与结构的社区组织。基此，就人数参与之众，人力动用之广，参与社团之多而言，华侨社会在组织上远较侨生华人社区完善得多。
* 华侨社会人数众多、资力鼎厚，组织完善与坚实。是故，一当面临共同危机与紧张情势时，这种势众财雄及娴熟的运作技巧即可迅速投向社会或政治行动中。所以说，新加坡华侨社会中的帮派组织，不能说是无助于社会及政治动员工作的。陈嘉庚虽然乃以厌恶帮派观念及帮派势力著称，却又实事求是地充分调动与利用其本帮之势力以提高及巩固本人之领导地位及力量。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仍未出现明显的阶级分野现象。工人阶级在新加坡人数众多，惟多为文盲，政治敏悟力低，工人阶级意识觉醒仍有待形成。况且，英国之封禁马共及施行阻止共党势力操纵工会之措施，对工人阶级团体之出现，对劳资尖锐对立局面的出现，皆起着巨大阻遏作用。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后的民族危机中，共产党人却充分动员新加坡华族工人以达致其社会与政治目标，如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及号召罢工等。迄至四十及五十年代，当各政党为扩大各自之政治势力时，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之阶级色彩才显得浓厚。
* 在组织上，二十世纪海峡殖民地的华侨社会是比较复杂的，它既有较新式的，也保有较古老的组织。古老的仍一脉相承，沿袭着血缘关系（如家庭、族亲或姓氏等）、宗教、秘密团体、同乡及帮派（如会馆及依据村、县、洲、省而组成之乡团）等脉络组成。而比较新式的组织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它包括商会、社交团体、专业团体、行业工会、文教体育团体、政党及职工会等等。虽然说它们中大多数乃属自发性的、互助性的团体，其中一些（如政党、职工会、私会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仍不失为压力团体。
* 这一些复杂与互相交错的社会网络却为各帮及社会领袖提供了组织上及势力上的地盘。这些领袖即通过它们施加影响贯彻彼等在帮派、社会及政治方面之倾向。是故，平心而论，这些新式与古老的团体乃为侨领袖与政治领袖之神经中枢。
* 年方十七之陈嘉庚于一八九零年晚秋南来新加坡，在新加坡他花了五十余年的岁月，寻觅、奋斗并最终获致了社会及政治领导大权。直至一九五零年五月回返新中国为止。他的来与去，象征着一个华侨时代的启始与一个重大时期的终结。在这个重大的时期中，华侨在新加坡岛上的华人社会里，一直努力不歇的争取及接受挑战并最终成功的统驭了社会及政治的领导。也不仅此，通过创办厦门大学、领导山东筹赈会、星华筹赈会、南侨筹赈总会，与公开支持四十年代之印尼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最终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政权，陈嘉庚已光芒焕发地成为了一个民族（中国的），乃至整个东南亚及亚洲的风云人物。